

推动数实融合重塑 实现经济创新发展

■夏杰长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所趋,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基于时代特征和当前产业发展态势,对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推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数实融合 是把握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当前,我国发展环境正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实体经济面临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的重大课题。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过程的逐渐加快,呈现出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互相嵌入、相互依存的状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形态,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选择。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助于促进经济高水平循环流转。当前,国内大循环的痛点在于内需循环不畅,有效供给不足。由于生产函数中知识、技术、数据、管理等新要素的贡献越来越大,供应链离散冗长且环环相扣,企业推动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升级的复杂性增加,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现

象愈发明显。与此同时,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已显示出巨大的变革潜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从而实现供需对接、跨界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生产方式变革。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新生产要素供给方面已经有了较强的能力储备。我国的传感器、机器人、数控机床等领域更加智能化、精准化,具备了大规模应用的基础;数字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位,数字技术逐渐成熟,达到了生产活动对高精准确性的要求;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创业活跃,拥有一大批细分行业领军企业。消费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孕育出了一批世界级的平台企业,更积累了海量电商、社交数据,为产业升级打下了重要的数据基础。整体上看,围绕“数据中台”的云数生态布局已全面铺开,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大、产业门类齐全、产业层次多样的特点,亦为数字技术的渗透提供了巨大市场空间和丰富应用场景。

数实融合 要创新形态及驱动要素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形态,是指基于数字技术,以数据、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高效协调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全面贯通多产业、

多业务、多场景的新经济形态,实现了数字技术从松散联结到实体嵌入,使供需衔接更加顺畅、供应链各方响应更加高效,在关键生产要素、生产组织方式、服务提供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均实现了创新。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主要依靠新要素驱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形态,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基座,以数据和知识作为主要投入,将创新应用作为发展基石,体现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要素的替代。依托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和产业体系,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致力于整合数据、技术和生产性服务等资源,重构供应链、重塑组织模式,实现装备、产品、技术、工艺等方面的创新突破。通过高效的互联网、物联网系统收集市场主体信息,并将消费领域同产业领域的打通,形成从产品研发设计到用户体验的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贯通,并依据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动态,灵活调整产品品类、优化产能,对市场需求变化作出敏捷反应。

数实融合 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着眼于全链条协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非着眼于单一环节或者单一流程的数字化,而是着眼于科技对全链条、全流程整体的赋能、改造

和提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形态,建立在全产业链资源优化配置、各环节泛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横向和纵向的高度融合,推动各方协同构建应用生态。从研发设计、工艺生成、物料供应、生产制造、测试交付到经营管理、市场服务,各个环节不但具有较高的数字化应用水平,而且全链条高效协同;在实时进行大数据汇总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产品功能设计,提高生产性服务的目标指向性。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致力于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通过集聚庞大供给主体和个性化需求表达,畅通供需循环,形成良好产业生态。随着各环节主体协同度的持续加深,供应链、产业链由传统的上下游线性关联转变为网络化交互协作,从而实现跨地域、跨领域、多主体的共生。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平台化发展。实体经济获取生产性服务特别是数字化服务的难点,主要体现在成本高、缺人才、变化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使得生产性服务业日益互联网化,由平台整合提供从低代码简单系统到复杂应用系统的趋势愈发明显。平台聚合了众多生产性服务厂商,日益形成以平台为中心、生产性服务厂商围绕的生态圈,为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提供助力。多样化生产性服务厂商借助平台提供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进行能力调用,实现可生长、可自由定义并搭建的生产性服务柔

性供给和快速低成本试错,帮助企业更好适应竞争环境。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推动生产和销售场景同多元化生产性服务的精准匹配,解决了需求全面化与生产性服务碎片化之间的矛盾。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形成高效率沟通。沟通变革是实体经济步入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时期的内生需求。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形态,依托互联网平台上的信息自由传导与高效沟通,推动了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广泛互联,促成了企业内部组织模式的“去中心化”创新,信息也不再是单向的线性流动模式,而是多向的网络流动模式。而依托网链结合的联系结构,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和营销组织方式得以重塑,企业从管理者转变为资源提供平台,帮助内部主体基于产业生态系统获取价值,在实现组织机制激活和创新环境营造的同时,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带动大中小各类市场主体相互融通。

总之,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所在。面向未来,我们要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从完善新型基础设施保障、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投融资支持、强化示范引领、提供人才保障等多方面,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内需潜能

■孙生阳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行长远谋划。

《纲要》强调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内需潜能”。因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释放内需潜能、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可以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充分释放内需潜在势能。

通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一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二者约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而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农村土地权利已经成为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为此,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经常居住

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高市民化质量;另一方面,健全农户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物质利益,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二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把县城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县城综合服务功能,把县城作为调配资源、综合布局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基本单元,提高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要构建乡村建设规划体系,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制定县城建设分类政策,合理引导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的建设发展。三是推动大都市周边县乡村的快速振兴,对接大都市巨大的消费潜力。一方面,周边县乡村要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大都市,与大都市共享基础设施,承接其人口外溢;另一方面,通过赋予周边县乡村新的功能,形成与城市群呼应、有互联互通的一个区域经济,让县乡村的经济和城

市群的经济能够互补起来。

通过积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善乡村市场体系和丰富乡村经济形态。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能够释放出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一是把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不断提高农民收入。要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驱动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稳定增长;要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注重培养农民发展生产、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的基本技能,激发欠发达地区农民内生发展动力。二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要支持既保障粮食安全又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平台发展,以建设优势特色产业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为抓手,发展现代高效种养和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比较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乡村文化等新产业新业态,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企业和农户在产业链

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新格局。三是构建以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为支撑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完善农村电商配套服务。要进一步提高对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确保到2025年顺利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目标;要做好对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设的规划工作,在保证物流普遍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完善电商配套服务,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

通过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打造内需新增长极。其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

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其二,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道路,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生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在粮食生产、生态保护等领域建立多种形式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局面。其三,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平稳过渡,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注重克服摆脱对欠发达地区“重输血、轻造血”的帮扶模式,在推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要统筹动态均衡、集聚增长、服务均等、安全发展的关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作者单位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